

華裔二代:白人食物對我意味著什麼?

“漢堡，”我叔叔在新澤西唯一一家像樣的中國餐館內隔著桌子指著我說道。“莉薩喜歡漢堡。對吧，莉薩？”

我回答是或是不，都無關緊要。我是這個家族中出生在美國的第一個成員，所以這個決定老早就有人替我做了。他們料想我會背棄中國飲食而喜愛美國食品：皇堡(Whoppers)、加奶酪的4盎司牛肉堡(Quarter Pounders)和帶洋蔥的白城堡漢堡(White Castle)。我後來的確這樣。

對我的親戚——來自菲律賓的華人移民——而言，這是我被同化而他們沒有這樣的證明。“你們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當我和表兄弟/姐妹央求著要吃大力水手(Popeyes)炸雞而非咸魚時，父親會搖著頭這樣說。

那是1986年，我當時10歲，我們家正奔跑在成為十足的美國人的快車道上。我們是街區里第一個擁有微波爐的家庭，我母親說我們可以在里面“照射”和“微爆”我們的食物。早餐是一大塊微波加熱的“薩拉-李牌”(Sara Lee)冷凍磅蛋糕。我們撕掉斯旺森(Swanson)的餓漢(Hungry-Man)電視便餐的塑料包裝，享用玉米粒、土豆泥和奶油朱古力塊。我會用微波爐加熱法式面包披薩，當作放學後的零食，會吃奇多(Cheetos)膨化食品、品客(Pringles)薯片，還會直接從罐子取雀巢檸檬茶粉。

在《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允許更多非歐洲人移民到美國之前，我的父母經歷了戰爭和獨裁統治。因為在童年嘗盡艱辛，他們出於過度補償的心理——同時伴隨一種負罪感——任由我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我被鼓勵同化，卻也因此被指責。

由於父母是在曾為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出生和長大，他們對美國食物和文化并不陌生。我母親很會做飯，但能負擔得起和享用美國方便食品，即美式富足，是讓我們感覺自己躋身中產階級的方式。

對我的父母來說，“美國的”往往等同於“白人的”，但我的白人朋友們吃的根本不是電視廣告中的食物。他們在家里吃無糖雙果醬、烤雞胸肉和芹菜。偶爾才會從真正的餅干罐里拿一塊燕麥餅干。我想不通怎麼有人能滿足於僅僅吃一塊。在我的中學食堂里，其他孩子吃花生果醬三明治和雙果的時候，我在盡情享用塞滿了美國干酪的熱狗。遇到餐廳菜單上有中餐的時候，端上來的往往是一份我都不知道是什麼的濕乎乎的面條狀東西。

我的白人朋友家里甚至沒有有線電視——他們的父母聽AM廣播，看PBS——但我父母說服了安裝有線電視的人，不僅給我們連上了Showtime和MTV，還有HBO、Cinemax和電影頻道(Movie Channel)。全都免費。

我沒時間看所有我想看的電視節目，哪怕是第五次看《炮彈飛車2》(Cannonball Run II)或《國家諷刺》(National Lampoon)雜誌的《歐洲假期》(European Vacation)——我看這部影片時，正忙著把Compos Baked Snacks外面的面餅啃掉，取出里面的一塊塊披薩味奶酪，把它們揉成一大團。我十分渴望我們家會被選中，成為尼爾森家庭(Nielsen family)，還痴想著保留一份電視觀看日記，好讓我的觀看習慣對收視率產生影響，但父母說我們永遠不會接到這樣的要求。

那是伊朗門事件曝光的年份，是“挑戰者”號(Challenger)爆炸和菲律賓發生“人民力量”革命的年份——這場革命推翻了在位20年的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美國政府將他飛到了夏威夷避難。(我和父母的確在電視上觀看了最後這個事件，至少看到了美國新聞媒體惠準播出的一些片段。)但是在當時的黃金時段，播出的是《科斯基秀》(The Cosby Show)、《家族風雲》



(Dallas)和《錦繡豪門》(Dynasty);還有整天不斷的遊戲節目。我一直盤算著怎麼才能在《價格猜猜猜》(The Price Is Right)節目中轉個轉盤或在《強棒出擊》(Press Your Luck)中按個按鈕，就贏到一輛新車、一套客廳家具或一趟瑞士游。

我想在《銷售的世紀》(Sale of the Century)節目中贏得現金大獎，在彩色氣球的環繞下接過一個裝滿現金的手提箱。就像父親每周帶回家的紐約樂透彩票和我在《紐約郵報》最後幾頁填寫的溫戈(Wingo)遊戲卡一樣，遊戲有獎賽節目就是一種純粹的可能性。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贏家；每個人都有可能一夜暴富。

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曾經寫道，美國媒體的“主旨不是帶來困擾，而是安撫”。美國電影和電視節目會幫助維持一種天真的幻想，它可以掩蓋我們國家的暴力。希瑪曼達·恩戈齊·阿迪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提到過美國的“對慰藉的迷戀”；朱諾·迪亞斯(Junot Diaz)說我們一心追求“令人安慰的敘述”。要維持美國例外論撫慰人心的神話，就必須保持其慰藉和天真的屬性，不管它有多麼虛假。或許我的童年也是如此。畢竟，我的家人擁有在表面上置身於政治之外的條件，可以試圖將自己從精

神和地理上與里根年代造成的破壞拉開距離。

通過調高電視的音量，大吃特吃Velveeta奶酪和Steak-umms牛肉切片，我們在竭力掩蓋自己的恐懼、對留在菲律賓的親戚們的內疚感，以及我們的經濟擔憂和內心的不確定性。還有什麼比這種絕望的拒絕更美國的？我們不需要證明我們是美國人；我們早就是了。

美國屬性和消費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我的朋友洛麗(Lori)過去經常在我們家吃午飯，她要求我母親做Spam午餐肉湯面、Spam午餐肉米飯，或加大塊Spam午餐肉的卡夫(Kraft)芝士通心粉。“我喜歡Spam，”她會說。“它太好了。”

有天下午，她不願意再吃這種東西。“我媽媽說Spam讓人倒胃口，”她一邊看著我母親放在她面前的碗一邊說道。她把碗拉近了一點，然後又推開。“我媽說她永遠不會用它做飯，也不會吃它。”

洛麗回家之後，我母親翻著白眼說，“美國人一直都吃熱狗，熱狗跟Spam是一樣的東西。”

“Spam怎麼啦？”我父親說。“Spam是美國食品。”

這話有幾分真。在各個戰時占領期，美國軍隊曾把Spam帶到關島、韓國(專題)、日本和菲律賓去，它們成了世界上食用Spam最多的一些地方。在菲律賓，吃Spam沒什麼好丟人的。但我們家把這種美國食品又帶回了美國，現在我們被告知，這種東西不能吃。

有關移民的一種占據主導地位的敘事描繪了兩種文化通過食物相融合的美好景象，就好比在我母親會往我們的感恩節火雞里塞糯米。但是在現實中，同化來得更暴力，歷史更複雜，文化則沒有那麼截然不同。我曾大口吞下在我眼中屬於美國常態的食物，但我依然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國人。或許根本就沒有美國常態這種東西；或許美國常態本身只是一種表演。

最終，我大吃特吃的有著鮮艷喜氣包裝的東西，破壞了我的健康，令我出現食物過敏和慢性自身免疫問題。如今，吃一小塊披薩或一小把Doritos玉米片，就會讓我出數周的蕁麻疹。

然而每過一段時間，我就會深深地羨慕那些想吃什麼就能吃什麼且不會有不良後果的人，盡管我羨慕的可能只是1986年的天真，一種從未真正存在過的天真，是羨慕我以前那樣直奔商場美食廣場上賣漢堡的攤位。多加奶酪。加洋蔥圈。就著一杯奶昔一起吃下。或者是吃一份微波一熱就可食用的方便晚餐——這種食物在聲音開得很大的電視機前，一邊目不轉睛地看著一邊吃的時候，永遠不像它盒子上亮眼的包裝圖看起來那麼美味。

「藏匿運輸」非法移民，中餐館恐成川普政府嚴打對象

司法部長塞辛斯(Jeff Sessions)11日向全國聯邦檢察官發執法備忘錄，要求檢察官對違反移民法的行為提出刑事指控，其中要求對“藏匿”(harboring)及“運送”(transporting)無證移民者嚴打。移民律師指出，不少華裔在外州經營餐館等生意雇用無證移民並提供食宿交通，在此執法指南下便易被歸為“藏匿”和“運送”無證移民，恐成嚴打目標。

塞辛斯11日在備忘錄表明，聯邦檢察官應對任何有運送、藏匿非法移民的案件進行執法並提起刑事訴訟；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優先執法對象包括將三名以上外國人非法帶入美國者，為三名以上非法移民提供交通或住宿者，以及在非法帶入、運輸和提供住宿過程中，造成嚴重受傷甚至死亡及有性侵犯行為，且有造成法律條款向此類執法提供依據。

移民律師指出，諸多在紐約州外、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經營餐館等華人業者，若為雇員提供食宿交通，恐將在這波執法風暴中成優先目標。

新備忘錄可見塞辛斯對待非法移民“夠狠”，聯邦移民執法將有顯著提高，在外州尤其是偏遠州開餐館的華人業者，為雇員提供免費食宿及上下班接送是常見做法，但此類行為完全符合備忘錄對“藏匿”和“運送”非法移民的定義，在聯邦接下來的重拳執法中恐將首當其衝，遭刑事指控而辯解無門。

“藏匿”非法移民是比“雇用”非法移民更為嚴重的罪名，一旦被定為“藏匿”，後果非常嚴重。作為房東將房屋出租給無證移民，因房東並無責任查房客移民狀態，可辯解不知情；但雇主不可能不知雇員的移民狀態，提供住宿及交通，構成“藏匿”無證移民罪名便難以辯解。李定一還說，移民執法趨嚴，有父母提供偷渡費助子女偷渡來美，待子女獲得身分後給父母辦移民時，在領館問話中被問及“當年是否為子女偷渡提供金錢”，回答是就被冠上“蛇頭”罪名。

業者不要給雇員提供免費住宿是唯一可能的規避方法，外州請人難，提供免費食宿和接送雖為吸引員工的常見手法，但在目前環境下，業者最好以提供金錢補貼，讓員工自行租房、雇車上下班等方式，避免犯下大罪。

諸多移民團體亦對塞辛斯新備忘錄進行強烈譴責，指出其盡所能將移民群體“有罪化”。“造路紐約”(Make the Road New York)共同執行長Javier Valdes便指出，塞辛斯此舉威脅與無證移民站在一起、為無證移民提供住房、保護之人，讓移民社區陷入恐懼和互不信任之中。



“百人會”(Committee of 100)會長吳華揚(Frank H. Wu)教授在《赫芬頓郵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關於新移民(專題)——給美國亞裔活動家的一封信》的文章，被海外華文媒體解讀為批評中國新移民，引起了很大的爭論。

“百人會”究竟是什麼？據資料顯示，“百人會”被認為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華人組織之一，社團中大約只有150人，但都是由美國業界的華裔(專題)精英和成功人士組成，如美國首位華裔州長及前商務部部長駱家輝、雅虎網站創辦人楊致遠、前谷歌全球副總裁及創新工場創始人李開復、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諾貝爾物理獎或化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專題)、丁肇中、李政道、李遠哲等都是該組織成員；文化界精英則包括華人女作家張純如、導演吳宇森、演員陳沖、劉玉玲等。這麼多重量級人物雲集的美國老華人社團，其會長出來指責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分量很重，聽著還真可怕。

懷著對名人敬仰的心情我拜讀了吳教授的文章，發現吳教授大約表達瞭如下幾個意思：他們中國新移民素質低拖累了我們的名聲、我們嘗試教育新移民懂規矩但無法溝通、他們新移民與中國聯繫緊密所以無法融入美國文化、我們之間除了長相什麼都不一樣、他們新移民數量太多了，馬上要把我們擠成小眾了，我們的地位要尷尬了，美國主流文化要受衝擊了，大家要重視啊。

瞧這一口一個“他們”、“我們”的，既然是新移民，那也已是自己的美國同胞了。把屬同一國籍而且還是同民族人民粗暴地分為“他們”和“我們”，不知這位教授生活在美國這麼多年，是如何理解美國精神之一的大熔爐理想的？美國連如此精英的人物都沒有包容精神，難道美國的大熔爐是真的破產了，只是一碗民族大拼盤(salad bowl)而已？連同民族的人群都不願包容，吳教授又是怎麼做到真正地與白人和黑人們融合呢？

在滿篇的“我們”和“他們”之中，隱藏著一個詞：“你們”——這就是這篇文章的讀者，美國

的“主流社會”。“主流社會”讀者們像高高在上鐵面無私的老爺一樣，看著階下的管家哭訴，“他們這些外來人，長著跟我一樣的臉，不守這里的規矩，還很高調地搞自己的圈子，不融入到您的勢力圈，與您分庭抗禮，連累我的形象，我可是您勢力圈里的人啊，這讓我怎麼在您這里混，您可要為我評理。”

這些讓我想起了一個人物——奧斯卡獲獎

美華裔精英看不起中國新移民?

影片《被解救的姜戈》里的黑人老管家。當他看到自由黑人姜戈騎馬而來(在當時的社會，黑人沒有資格騎馬)時表情是這樣變化的：

感謝老戲骨薩繆爾在這裡奉獻的精彩絕倫的演技，讓我看到了一個“精英”是如何敵視一個擁有自由身份的同胞。老管家在南方莊園中掌管一切事物，深受主人信任，在黑人同胞之中可謂“人上人”的成功精英。

他是一名黑人，卻在蓄奴制中成為受益者，那麼他維護蓄奴制甚至表現得比白人更積極也就好理解了。所以當他看到一個黑人居然挺直腰桿騎在馬上，先是表現驚訝，之後轉驚為怒，並上前與之怒駭，然後在主人面前告狀和表達不滿。這樣類似的情況其實哪里都有，比如在中國，許多支持重男輕女傳統的人，自己也是女人。可能吳教授並沒有像黑人管家這麼不堪，但道理類似，我這里只是打個比方而已。

這篇文章出自老華人社團的領袖，可見不僅很多美國“洋人”無法理解並接受中國的崛起，連融入美國文化的美國老華人們也無法理解。

其實，新移民是中國崛起的縮影和窗口，一些中國人素質低下，那是因為中國崛起得太快，以至於30年前還生活在低收入社會，沒有經過良好的現代系統教育的人也變富了，在外就顯露出了很多壞習慣，並隨著發達的社交媒體壞事傳萬里；而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一代中國人的素質就要好很多，北京的廁紙事件就說明瞭

這點。

由於人口基數大，低素質的中國人數量絕對值也大，再加上一些人用放大鏡審視和主觀地擴大偏見，中國新移民就被掛上“素質低”這一標籤了。其實如果按比例看，中國人的素質並不是美國各民族里最差的。退一步說，部分中國新移民素質低沒錯，但這並不是中國文化的問題，而是暫時的經濟問題，要怪只能怪中國崛起

得太快。而中國崛起得快是壞事嗎？至少對中國人來說肯定不是，不知道對吳教授而言是不是。

中國新移民群體(尤其是21世紀出國的中國移民)與老移民相比，確實是有巨大的變化的。老移民因語言不通和沒有技術，大多在美國從事苦力和低級勞動，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拼搏終於培養出了全套西方式文化的美國精英，這些精英融入美國社會，成為美國主流社會價值觀和體制的受益人。但無論他們如何優秀，他們其實仍是美國體制的被動接受者而不是變革者。而中國新移民以及其身後的中國資本力量強勢人駐美國，使得華人以一種嶄新的面貌重新進入西方社會：不再像過去那樣唯唯諾諾、低聲下氣地被動接受西方價值觀和體制。

中國本土經濟和文化的強勢使得這些新移民一直與美國有密切的聯繫(而不僅僅是吳教授認為的信息技術發達)，許多新移民的謀生業務開始仰仗中國的公司和市場，因此中國新移民雖然英語水平很好，但從文化、價值觀等方面一直主要受中國影響而不是西方國家，使得新移民一點都不像西方人。即使他們持有的是西方護照，即使他們有很多西方國家的朋友同事，即使他們對西方規則、法律和文化瞭如指掌，他們仍然一點都不像西方人。

正如黑人管家無法接受隨之而來的解放黑奴運動一樣，吳教授也無法接受文化和經濟自信的華人同胞，無法接受“身邊騎馬的黑人”越來越多。只能說吳教授是個保守派，而他的保守

心態可能存在于任何舊時代的既得利益者身上。我只希望這樣的保守人士真的只有一百來人而已，希望“百人會”並不是所有人都是保守派。

話又說回來，什麼才是美國人最愛標榜的所謂“美國精神”？我覺得是自由。美國的所謂主流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其實都是由其成員們自由地從世界各地遷徙而去，自由地住在一起自然而然形成的，很少有人敢跳出來說，這是我們美國的主流文化定式，新來的美國人必須遵守，不得改變。

其實，美國建國至今，其價值觀和文化一直在改變，現在新時代的中國移民來了，自然也會有所改變。中國移民將在美國置業安家，將在美國佔據重要的經濟地位，將在美國參政議政乃至通過政治獻金影響美國政治，中美之間規模龐大的貿易和交流將在文化和生活上影響美國。中國強勢崛起，一年增長出一個俄羅斯，四年增長出一個日本，給世界帶來巨大的變化，那麼美國作為開放的國家，自然也會受這種變化的影響。如果美國哪天不變化了，才真的值得愛美國的吳教授擔憂，因為這意味著美國閉關鎖國，這是美國要落後挨打的先兆。

吳教授們也應該挺直腰桿，改改過去的老觀念了，不要總想著被動地“融入”美國社會，華人移民越來越多，華文化和經濟也越來越強勢，中美文化的“互相融入”才是最自然的。就好像你以前窮，去朋友家時拿不出什麼禮物，現在有點錢了，去朋友家時給朋友帶點伴手禮。朋友接受禮物，將禮物擺在自己家里，成為朋友家的一部分，這不才是最自然的嗎？

如果吳教授們不願意改自己的老觀念，那也沒有關係，吳教授們即使伸出手來阻擋也會最終被無情地被歷史車輪碾過，正如吳教授所預見的：“If we do not win them over or ally with them, they will overtake us numerically and render us politically irrelevant.”所以，吳教授也應該遵守美國標榜的另一個精神：民主。中國新移民將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保守派，吳教授們還是少數服從多數吧。